

数智时代大学治理的时空再造与价值重构

——基于时空社会学的视角

王丹^{1,2}, 吴立保¹

(1.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南京 210044;2.淮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 从时空社会学理论视角出发,研究重新审视数智时代大学治理的底层逻辑,从时空再造和价值重构两个方面探讨观念转变对大学治理的影响。时空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使大学治理面临包括价值观偏颇引发时间饥荒、技术运用导致伦理空间越界、智能化浪潮催生时空延伸以及资本和技术加剧时空压缩的风险隐忧。基于此,提出数智时代大学治理的时空调适路径:以信息时空调适推动智能化发展,以权责时空提高整体性治理效能,以文化时空引领文化重构,以规范时空重塑韧性治理新模式。

【关键词】 数智时代;大学治理;时空再造;价值重构;时空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章编号】** 1003-8418(2026)02-0085-0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36/j.cnki.jshe.2026.02.010

【作者简介】 王丹(1986—),女,安徽萧县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生,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吴立保(1970—),男,安徽六安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大学治理是实现大学“善治”的手段和方法,是实现大学治理现代化和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关键所在。在以数据驱动、虚实融合、开放互动和沉浸式体验为特征的数智时代,大学治理的时空结构正经历深刻变革,传统治理模式的线性结构与静态边界被逐步消解。技术应用在改变大学治理权力分配与决策流程的同时,不断挤压治理主体的时空自主性。时空社会学中“时空是社会关系的实践建构”的观点为解析大学治理的时空问题提供了新视角。从时空社会学观点出发,大学治理既是技术性时空规训的对象,又是治理主体通过制度创新重构时空秩序的实践场。本文按照“时空问题—风险隐忧—时空调适”的分析脉络重新审视数智时代大学治理的时空需求,为大学治理的时空问题寻求解决之道。

一、数智时代大学治理的理论局限 与时空社会学嵌入

理论的适配性源于对大学治理现有理论局限

的正确认知和对时空发展需求的深入理解,因此,文章从大学治理理论局限和时空社会学嵌入的可能性两个方面探讨理论的适配性。

(一)理论局限

数智时代,大学治理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并分化出技术治理、组织变革、政策分析、伦理批判等学术流派。技术治理学派强调大学治理中技术的工具效能^{[1][2][3]},但忽视技术不仅是工具,更是时空秩序的生产者,将大学治理简化为技术适配问题;组织变革学派揭示数智时代大学治理中权力流动^{[4][5]},但缺乏对时空变革下组织韧性的讨论;政策分析学派探讨政府—大学—市场的新型治理关系,倡导构建多元治理框架^{[6][7]},却未及时空情境适配性对政策执行的影响;伦理批判学派从算法偏见、隐私泄露等出发,提出大学治理的伦理治理原则,但多集中于静态分析^[8],未揭示时空动态性如何加剧伦理问题。数智时代大学治理的社会机制愈加复杂,既有研究未能全面审视并深入解答大学治理中的时空和价值理念转变对实

践的影响,因此迫切需要引入新的理论视角探讨数智技术对大学治理时空维度与价值体系的深层作用。

(二)时空社会学嵌入

时空社会学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是社会学回应全球化时空重构危机的跨学科产物。时空社会学以批判性视角揭示时空并非中性容器,而是通过实践动态建构权力与价值的关系性场域^[9],它通过继承马克思“实践是人类发展空间”的辩证观并融合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布迪厄的时间政治理论、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以及社会批判等理论后,提出“时空是社会关系的实践性建构”的核心观点^[10]。本文借助整体主义视角对社会时空进行深入分析,理性思考并回答现代社会发展带来的时空转换问题。时空作为治理实践的内生变量,通过技术赋能与主体实践的双向路径,深刻影响大学治理的范式与效能。这种影响既体现为技术驱动的时空转型,又表现为治理实践的时空反塑。一方面,社会实践加速流动倒逼大学治理节奏压缩,出现“系统响应越快,工作压力越大”的时间荒效应;线上、线下等多重空间共在迫使大学治理突破物理边界,通过技术实行的“虚拟统筹”重构不同区域教师的空间权力分配;虚拟和现实的时空共变重塑传统社会大学治理的价值诉求,表面上数智技术以“技术红利”提升治理效能,实则可能掩盖时空正义的问题。另一方面,大学治理主体并非被动接受技术规训,而是通过制度创新与文化抵抗重构时空秩序,通过构建“弹性时空”等调适行动,以实践助推理论变革。时空社会学的独特价值在于理论层面以“时空即实践”的本体论取代技术工具论,革新大学治理范式;在实践层面通过主体抵抗、文化重构等时空调适行动化解工具理性危机;在价值层面推动大学治理中技术赋能与人文温度的辩证统一,真正实现大学“善治”。

二、数智时代大学治理活动场域的时空再造与价值重构

数智技术作为数智时代大学治理的重要表征,形塑大学治理活动场域的时空与价值要素。

面对技术发展,我们需要从时间和空间这对现代社会生产的构成性要素出发^[11],重构大学治理理论的时空范畴。

(一)时空再造:数智技术再造大学治理新场域

在大学治理中,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元宇宙等智能技术的使用改变了以“空间的低度延伸支撑着时间高度凝聚”的传统治理方式,构建了以信息范式为核心的“流动空间”^[12],流动空间中时空动态共存、虚实交叉融通重新建构以空间拓展和时间延伸为特征的治理新场域。

1.空间拓展:虚实共融的治理空间革命

海德格尔认为空间是人与事物的互动关系^[13]。爱德华·索杰和卡尔·波普尔则进一步划分空间维度^{[14][15]},将空间分为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异质空间”和知识空间等,这些空间框架容易受技术的影响,出现以虚实共存为特征的边界拓展。

数智时代,技术变革影响空间变化,进而影响治理形态,这为大学治理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这具体表现为:第一,空间作为大学治理的活动场域,不仅能够通过技术赋能重塑大学内部治理空间,更能够在宏大的拓展空间中为组织行动提供背景选择^[16]。大数据挖掘与分析等智能技术的使用,将大学组织中复杂的人事管理、行政事务、教学评价、学术考核等治理过程变得直观明了,显著提高大学内部治理效能。数智技术的应用提升了多元治理主体的社会参与度,拓展大学治理的外部空间,并不断提升大学的社会影响力。例如,为提升教育普惠性,浙江大学通过“智云课堂”向社会开放校内教学资源^[17]。第二,数智技术通过重构大学治理的物理与虚拟空间,重塑大学治理主体的行动边界,增强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动态交互。虚实融合的跨学科、跨区域研究平台的建立,不断拓展大学治理的研究空间,加速学术与产业实践的紧密结合,促进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例如,清华大学和华为公司在2019年建立联合研究院,通过虚拟实践等方式在AI、6G、半导体等领域联合攻关并发表论文20余篇,孵化专利10余项。第三,数智技术在扩展空间的同时不断重塑

组织事务管理的交互关系。例如,人工智能能够依据主体复杂性需求,进行个性化数据处理,提升大学治理服务于“人”的现实需求;大数据能将治理中的资源要素、主体对象和结构关系进行虚拟联结,直观、透明地架构出大学治理过程中人的权责边界,有效提升大学治理的效率。

2.时间延伸:全时间性的治理经验革命

康德认为,时间的有效性存在于能被人们所知觉的现象或事物中并在经验的使用范围内呈现^[18]。从伯格森时间的“绵延”到巴什拉的“瞬间”再到海德格尔的“当下”,人们试图通过对本真时间的辩证,从时间的内在意识中构建对事物的真实感知。数智技术通过记录、保存、重溯等方式将时间数据化、分割化,技术赋予时间在“绵延”中实现“瞬间”的定格,人们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切换中增强对时间弹性和韧性的主观感受,进而在全时间性内重新知觉大学治理的经验革命。

在数智时代,技术变革影响人们对时间的知觉与意识,进而影响大学治理的关键组成和形态特征。这具体表现为:第一,数智技术延伸时间利用性,将“瞬间”和“当下”内嵌于时间的“绵延”之中。在“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主客体都以网络化形式存在”的现代社会,各类信息在自然时间内被自由延展并保存,过去时间可以被自由查阅、跳转,为现在和未来提供决策依据。大学治理亦借助时间的延展性进行决策,在科学准确的基础上保障治理流程的连续性和动态性。例如,高校利用大数据分析学习者的食堂消费数据,为贫困生认定提供决策依据。第二,数智技术延伸时间体验感,在重塑“内在时间意识”中凝聚大学治理权力的核心要义。在虚实融合的教学场景中,师生主体突破了线性时间束缚,通过全感官行动响应将沉浸式信息体验融入时间刻度,通过内化回忆、增强感觉和想象的时间意识重构大学治理的教学权力。研究表明,虚实融通的教学场景通过对真实事件的时间重塑增强数字公民的学习效果^[19]。第三,数智技术延伸时间创造性。在大学治理中,数智技术通过对特定行为事件的时间参数进行编辑、排序和模拟演化,并依据演化结果优化决策过程。例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通过搭建电子顾问,模拟

不同选课路径对毕业时间的影响,从而对毕业困难学生进行个性化指导^[20]。数智技术通过对时间横向和纵向的分析和比较,关注治理过程动态异质性需求,以进一步体现大学治理的人文关怀。

(二)价值重构:数智技术再塑大学治理新价值

技术作为一种文化与社会建构,它承担的最重要的工作便是“产出以及建构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关系”^[21]。数智技术作为新一轮技术代表,将技术蕴含的内在潜能与社会影响转化为丰富的社会价值空间。这些价值通过重塑大学治理中信息、权利、文化和规范进行集中体现。

1.信息价值

信息系统创始人戴维斯认为,信息是那些实际可察觉的、有价值的并经过处理的数据,它对接受者当前的或潜在的行动或决策有意义^[22]。数据作为信息表征的重要形式,是教育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基础,并快速成为驱动教育变革和支撑教育治理的新动力^[23]。数据在大学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赋予信息全新的价值。这具体表现为:第一,数据信息作为新型生产要素,通过与其他要素相互融合促进大学治理的全面升级。在数智时代,数据信息渗透在大学知识生产、流通、使用和管理的全过程,通过对数据信息的挖掘和处理能够显著催生新质教育资料、创新教学方式、促进教育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研究表明,数据分析是推动大学治理主体参与决策、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促进因素^[24]。第二,数智技术创新信息公开机制,推动信息共享,增强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治理的意愿。信息资源共享理论认为,信息利用服从于收益递增规律,即信息利用得越充分,产生的收益就越大^[25]。技术运用能够协助高校建立各种信息公开平台,解决信息共享范围受限的问题,将拥有信息优势的主体以高校为核心顺畅辐射到政府、社会、个人等利益共同体,保障大学治理的公正性和透明性。

2.权力价值

王世权认为,大学治理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其本质是各利益相关者基于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博弈均衡的概要标准^[26]。西蒙·马金森从全球高

等教育发展入手,认为既定的权力更偏好封闭性和排他性,因此我们需要讨论权力地图开放性问题^[27]。智能技术的使用促使权力地图的开放,重塑大学治理的权力结构。这具体表现为:一是智能技术加速大学治理权力的逻辑转换。我国大学治理的历史发展进程可以总结为权力的强制性单向行使向国家与社会关系良性互动的治理逻辑转变^[28]。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技术通过搭建平台、加强沟通等工具措施将大学权力精英治理与民主参与价值紧密结合,改善大学治理中既得利益群体与权力精英互为强化的现状,教师、学生和社会成员参与大学治理的易入性,改善利益主体间话语权不对等关系,重塑大学治理的权力价值。第二,权力作为一种“有目的的影响”^[29],智能技术通过消弭其场域限制,助推大学治理权由封闭向开放转变。数智技术的可视化、即时性等特征能够减少行政权力的滥用和不当干预,加快“去行政化”改革,推动建立与权力对等的责任体系和影响范围,改善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对抗,促进大学与政府、社会、公众、个人等利益相关者紧密结合,形成多元、开放的共治新格局。研究表明,以治理共同体为纽带的大学治理结构能够有效推进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30]。

3.文化价值

在人类发展史中,重大技术变革产生独特的“文化构成”,相应地,“技术基础”亦支撑社会文化发展,构成独特的文化价值。文化作为一种治理工具^[31],通过提供新的文化情境,整合文化认同和价值规范,将传统社会管理的控制技术向社会个体的自我治理进行转化^[32],这种转化通过学术规范和价值理念深嵌于大学治理场域。这具体表现为:一是智能技术整合行政文化与学术文化分野,在大力弘扬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加强治理利益共同体的情感联系,形成学术—行政共进的网络式治理文化^[33]。数智技术能够通过现实与虚拟的融合,构建不同的文化情境,在重现和重视历史文化的同时,为多元主体提供多层次、多场域交流沟通空间,在强化大学精神文化价值引领的基础上,回归对大学文化的价值认同。二是通过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创设多元文化对话空间,借

助数字平台消除学科文化壁垒,在多学科融合中致力于从0到1的原始创新和从1到0的应用创新,以创新文化驱动创新力量,进一步推动大学善治^[34]。三是强化大学公共文化精神,通过数据可视化等技术手段提升治理的公共性与能见度。例如,杭州西湖大学回归学术本真的创新文化有效地促进大学系统内部的深刻变革,形成科学创新与人才培养的良性互动,有效提升大学治理的整体效能^[35]。这种文化重塑本质上完成了从外部管控到文化自觉的治理转型,使学术规范、行政准则与公共精神形成有机统一的价值认同体系。

4.规范价值

数智技术在构建大学治理空间的同时亦产生新的空间意识和行为准则,从而构建大学治理规范的新形态。这具体表现为:第一,数智技术促进大学自治规范性的形成。信息技术从互联网过渡到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时代,人类逐渐由“社会契约”走向“智能合约”,大学治理的契约理念亦由自由、信用向正义、共识进行转变。智能合约通过去中心化的技术协定达成隐性共识,促进大学治理群体实现共在自治。第二,数智技术通过规范平衡治理权力的扩张与收缩。大学治理规范理应明晰权力主体之间的权力边界,数智技术表现出的韧性治理特性能够以“去权威化”的技术倾向平衡治理主体的“非对称困境”,并以技术为支撑对规范性设计进行适应调整。第三,数智技术重塑道德教育空间规范。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推动德育环境从封闭的校园空间向开放的智能社会空间延伸,倒逼大学治理建立跨域协同的数据伦理规范。然而,在大学治理中,道德教育的规范性空间与智能技术还未达到同频共振的要求,依然存在隐私泄露、算法欺诈等伦理风险^[36],人机关系异化、创生困难凸显等道德教育问题仍是伦理研究关注的焦点。

三、风险隐忧:数智时代大学治理的时空问题

大学治理的理念深刻影响实践行动^[37]。数智时代,技术重塑大学治理的时空和价值理念,并最终影响治理行动。然而,在大学治理的实践应用中,对时空要素和价值行动认识的缺位带来诸

如价值观偏颇引发时间荒、技术运用中关系不和谐带来伦理空间越界以及技术发展与资本压制导致时空延伸和压缩的风险隐忧。

(一) 价值规训偏颇引发时间荒

时间荒指在制度性的工作时间内无法完成任务或达到目标,人们被迫延长工作时间,挤压自由时间的现象。时间荒既是一种客观的时间约束,也是主观的时间体验^[38]。罗萨认为科技加速迫使人们“自愿做某些不是自己真的想做”的事,从而从客观和主观上加剧时间荒的进一步发生^[39]。在现代大学治理实践中,绩效导向的治理逻辑正在异化大学治理的本质。现代性将时间转化为可计量的资源,大学治理存在将学术价值简化为科研成果产出率、就业数据成长率、大学排名提升率等可测量的时空单元等现象,大学治理的工具性转向日益明显。在这一过程中,技术通过精细化管理和复杂化流程控制,加剧对治理主体时间的结构性挤占。过度强调进步和效率刚性化绩效,容易忽视教育的本质,导致时间被工具化。这具体表现为,教师将教学和研究都转向易于出成果的“学术短视”领域,大学的文化创新功能逐步让位于生存指标。有研究表明,近年来学术论文的产出呈现爆发式增长,然而思想的革新却愈发迟滞,甚至陷入范式固化的困境^[40]。另外,数据驱动的治理模式将治理主体的劳动过程分解为可计量单元,并在计量单位内分配大量任务,“在较少时间内做更多事”的组织要求进一步强化了时间荒。例如,某些“双一流”高校“非升即走”“预聘长聘”的考核制度实际上是以时间剥削为核心的学术压榨^[41]。这种制度和价值规训导致的时间压迫既违背了学术共同体自我治理的传统,又通过异化大学组织的管理属性进一步加剧时间荒现象的发生。

(二) 技术运用导致伦理空间越界

空间作为“一种开放的持续生产”是“关系、谈判、参与实践和各种形式权力的领域”^[42]。智能技术的运用为大学治理创造新型关系、实践、权力的同时亦受技术的反向影响。技术改变治理空间的演变速度,对传统伦理关系和实践权力提出挑战,大学治理出现伦理空间越界和创生空间窄化

的问题。第一,大学治理依赖于数据的全周期捕获,促使师生将学习和生活全面接入技术系统,然而,技术的非透明性和数据采集的“黑箱”效应使数据从采集到应用均存在泄露风险。第二,数智技术的使用促使治理主体深度依赖技术呈现的理性决策,以人为本的经验探索在一定程度上遭到解构。工具理性的扩张致使“人—机”关系凌驾于“人—人”关系之上,技术正暴力入侵传统伦理边界,异化大学治理中人对自由、创新愿景的追逐^[43]。第三,智能技术依靠数据“喂养”的特性,是造成创造性生成空间窄化的主因。数智技术“创造”的本质依赖于对历史信息和治理方法的学习,“创造”的质量取决于数据“喂养”的质量、数量和丰富度。然而,在大学治理实践中,数据可以帮助校内各部门实现精准判断,但也很容易被某些部门基于某些目的有选择性地过滤、截留和屏蔽。数据输入全面准确的困难性和知识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导致依赖数智技术的人陷入创造性生成窄化的创新困境。技术正在以隐匿的方式不断翻越伦理的院墙,人类在由智能技术构筑的伦理迷宫中逐渐丢失自我选择、决策和创造的权利。

(三) 资本和技术加剧时空延展和时空压缩

时空延展和时空压缩本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但数智技术的发展拉大了这对矛盾概念的两极,使社会时空中的人既处于治理边界扩展的时空延展之中又处于“周转时间的加速和空间范围缩减”的时空压缩中^[44]。数智技术通过为时间和空间提供虚实融通的双重相遇,加速时空延展和压缩的特征,在这一特征下全球化成为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置身于社会关系强化的全球化时代,人们对时空维度的体验变成了“现存的就是全部存在的地步”^[45]，“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46],历史、现在和未来被压缩成断点的同时又被虚实融通技术延展成虚实共存状态。在大学治理实践中,作为治理标准的精细的法规、条例、方案、计划、指标等具有天然的滞后性,而依据政策文件进行大学治理的决策和管理则忽视了现在情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为大学治理带来新的风

险。除此之外,大学治理主体和参与人在面临时间断点的同时还要面临虚拟与现实、单边与多元等多重空间选择的困难,以及由此带来的治理共识不确定问题和社会共识凝聚困难的风险。数智技术改变知识生产方式、速度、结构和规模,在虚实共存融通的多元治理场域中,信息的快速传播塑造多元主体的价值观念和治理意识。然而,世界范围内多种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汇聚在压缩时空内,大学治理在治理主体多元、机制多样与目标多维的时空交织中受多重信息和知识的影响,难以达成治理共识和社会共识^[47],进一步影响高效、灵活、开放和包容的治理体系构建。

四、循环共治:数智时代大学治理的时空调适

面对技术发展带来的时空困境,我们需要从时间和空间这对现代社会生产的构成性要素出发,从理念认识上关注大学治理的时空特征和价值要素,通过构建信息时空、权力时空、文化时空和规范时空共塑大学治理的时空调适路径。

(一)信息时空:以弹性适配推动数智时代大学治理的发展指向

数智技术的深化应用促使大学治理迈入“信息泛在化”时代,信息时空的迭代升级不仅要解决技术适配问题,更需要构建兼顾效率与伦理的弹性适配治理范式。基于卡斯特“流动空间”理论和我国大学治理的现实需求,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重构信息时空。第一,构建“硬件层—连接层—应用层”数据治理体系,以解决数据碎片化和时间挤出效应。硬件层通过部署跨校区分布式数据节点,采用算法联动的协同计算,减少基层数据重复填报;连接层通过多模态数据分析形成可视化“治理关系图谱”,精准识别行政流程堵点;应用层通过时空感知引擎,智能避让非紧急流程,从而缓解时间挤压效应。第二,构建以大学治理系统为依托的“教学研创”数据信息应用空间。信息的价值取决于信息传播的范围和应用的空间,在实践应用中应重视虚拟与现实数据的融通,通过数据信息空间扩充,打造虚实融合的数字、智能化治理新方案。第三,通过区块链技术保障数据安全,确保数据收集、存储和应用过程的数据确权,克服技术

运用导致的伦理空间越界问题。另外,针对数据服务于人的发展这一治理宗旨,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同时要结合人的情感特性,给予人类在管理过程中应有的尊重和弹性治理的空间,通过建立“大学时空治理委员会”,将时间资源配置纳入高等教育评估指标,将循数治理与循情治理适度融合,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适度结合,以破解时间荒问题,展现我国大学治理的人性特色。

(二)权责时空:以开放协同提高数智时代大学治理效能

公共治理理论认为,提高治理效能的关键在于权力的流动与合理配置^[48]。数智技术改变大学治理中权力流动的中心性和层级性,推动大学治理向分权化和开放化转型。因此,提升数智时代大学治理的整体性效能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构建多元协同共治格局。优化大学治理中基层社会组织权力时空配置,提高社会组织中诸如产业界、研究所、创业机构和校友参与大学治理的权力,构建“产—学—研—创”一体化服务平台,以实践需求助推权力让渡。第二,打通权力流动的时空梗阻。以数智技术融通大学治理公共服务权力的时空梗阻,用好社会组织这一“中介缓冲器”^[49],在解决政府强制性干预的同时矫正大学趋同发展和自我封闭的趋向,督促大学在坚持公平与效率的同时促进资源开放与合作,在弥合大学与政府的认知差距中积极回应社会的利益诉求。第三,强化师生主体的治理核心地位。强化学术治理的核心地位,将治理权力下放至教师和学生,以加速去行政化进程。树立科学理性的共享治理精神,在注重人的成长基础上,进一步鼓励教师坚持个人学术研究志趣,并将研究成果充分运用到教育教学中,促进大学治理主体从效率时钟到学术节律的自我成长。第四,通过建立线上线下学生社团组织等形式,充分发挥学生主体参与决策、听证、监督和评价的能力,防范决策风险,真正将治理权还给教学主体,从而实现大学治理的权责统一。

(三)文化时空:以人本共识引领数智时代大学治理的文化重构

智能技术将多重价值文化压缩在文化时空领

域内,造成治理主体的多重文化选择困难。文化作为“一个交错着权力、资源、认同感和真理等的争夺场域”,能为大学治理提供一套相对稳定并被广大民众接受的思想价值体系。和谐有序的文化空间构建能够凝聚大学治理多元主体的文化共识,建立数智时代大学治理的文化支持共同体,促进大学治理有序进行。数智时代大学治理的文化空间构建路径包括:第一,树立以“人”为中心的人本治理理念和文化引领,以共识凝聚人心。以人为本的文化价值引领有利于克服工具理性对大学治理造成的反向冲击,在充分重视多元治理主体情感交流和主体性发挥的基础上,鼓励多方互动,提升多元利益主体的参与感和主体责任感。提高多元利益主体的数字素养及自治意识,是建立以人为本的文化育人体系的基本要求。通过提高多元利益主体对数字意识、知识、技术和应用的认识,克服对技术的盲目崇拜,通过自我反思与外部培训提高数字素养,凝聚数字共识,引领大学治理的文化价值构建。第二,使用智能技术,建立虚实结合、顺畅的意愿表达机制,在广泛征集和精确分析的基础上,协调多元利益主体的价值冲突,以实践支撑为基础,建立高效、灵活、开放和包容的大学治理文化新时空。“大学文化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符号的直观观察、解释、理解达成互识和共识的”^[50],因此虚实融通的智能技术为大学文化建设提供直观观察、解释和理解的时空场域,为大学治理的文化构建提供基础和保障。

(四)规范时空:以韧性治理平衡数智时代大学治理的秩序与创新

马金森认为“复杂系统既产生系统化的规范,也产生开放的、创造性的事件,其中规范更为常见”^[51]。数智时代大学治理作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空间扩展、时间压缩、权力流变以及文化重构等新特征,这些特征在治理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需要以制度规范的形式予以落实,以保障多元化治理关系中价值平衡、利益平衡和权力平衡。然而,规范既为大学治理提供目标依据,又因其简化思维成为抑制大学创新发展的可能^[52],因此我们需要建立韧性治理新模式,进一步实现大学治理的复杂性行动。韧性治

理强调系统在保持核心功能的同时,通过持续性自我更新以及适应性动态调整以应对内外部环境的挑战,景天魁认为需要通过制度设计缓冲时空结构^[53]。基于以上观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重塑大学治理的规范时空。第一,要在宏观上建立弹性时序,允许不同部门和学科治理节奏的差异化。这种差异化不仅表现为依照不同学科特点,设置长周期评估和考核的差异化,更需要在微观执行层面形成人机互补的韧性评估创新文化。比如设置不同年龄的学术生命周期,针对新进教师适当减免行政负荷,针对成长期教师实行弹性考核,针对成熟期教师推行学术休假等,通过不同评估措施改善时间荒现象,给予教师创造性思考的时间,推动教学和学术的创新发展。第二,要充分认识数智技术与大学治理的赋能关系,重视与技术更新相适应的规范设计,以规范形式确立技术嵌入大学治理的理念、方式和价值,通过重塑大学治理中人的时空认知,以“时空结构二重性”的价值理念防范技术异化对人主体性的遮蔽和僭越,以人的个性化发展和多样化幸福的实现为基础建立和谐的“人—人”关系,体现大学治理的人文关怀和价值温度。第三,大学应当通过系统性培训培养治理主体的韧性素养,构建面向未来的善治体系。通过培养主体对技术决策的合理性批判能力建立大学治理的动态响应机制,有效应对治理过程中的创造性事件,以制度韧性应对规范中的稳定与创造配比。

【参考文献】

- [1]杨朔镇.数字技术嵌入大学学科治理的双重效应及其调适[J].电化教育研究,2025,46(03):72-78.
- [2]王晓茜.大学治理数字化转型:生成逻辑、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J].中国高教研究,2025(01):16-23.
- [3]陈林.人工智能嵌入大学治理的理论图景、价值蕴含与实现路径[J].高教探索,2024(01):13-22.
- [4]周作宇.大学治理何以可能?论大学的可治理性[J].中国远程教育,2025,45(01):31-58.
- [5][28]马永霞,葛于壮.从权力本位迈向权利本位——大学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转换[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4(06):180-185.
- [6]周作宇.谁治理:论大学治理主体[J].教育研究,2024,45(08):111-124.
- [7][30]陆风,崔华华,王一宁.教育共同体构建:大学治理能力

- 现代化的提升逻辑与路径[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5(04):148-154.
- [8]吴立保,吴晖.数字时代的大学治理:理论逻辑、现实挑战及其实施策略[J].江苏高教,2024(04):42-47.
- [9]景天魁,何健,邓万春,等.时空社会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89.
- [10](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1:40.
- [11]景天魁.时空社会学:一门前景无限的新兴学科[J].人文杂志,2013(07):99-106.
- [12](美)曼纽尔·卡斯泰尔.信息化城市[M].崔保国,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84-185.
- [13]任兵,陈志霞,胡小梅.时空再造与价值重构:面向未来数智治理的元宇宙[J].电子政务,2022(07):2-15.
- [14](美)爱德华·W.索尔.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95.
- [15](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M].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123.
- [16]黄文武,王建华.数智时代的大学韧性治理:内涵、目标与路径[J].中国高教研究,2024(04):39-46.
- [17]周宇,应鑫迪,陈文智.在线学习过程评价模型研究——以“学在浙大”在线教学平台为例[J].现代教育技术,2023,33(07):118-125.
- [18](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蓝公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97.
- [19]王晓晨,蔡进,杨浩.美国数字公民教育的游戏化学习课程建设及启示[J].电化教育研究,2021,42(07):122-128.
- [20](美)迈克尔·M.克劳,威廉·B.达巴斯.第五次浪潮:迎接教育的变革[M].褚颖,李燕秋,甘翠平,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2:137.
- [21]章梅芳,白馥兰.技术作为一种文化与社会建构[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0(06):141-151.
- [22]肖峰.科学技术哲学探新·学科篇[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21:210.
- [23]王健,蔡国春,宋苏轩.高校数据治理的新理路:基于集体行动的逻辑[J].江苏高教,2024(06):38-46.
- [24]Ashaari, M A, Singh, K S D, Abbasi, G A, et al. Big Data Analytics Capability for Improved Perform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he Era of IR 4.0: A Multi-analytical SEM & ANN Perspective[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2021(173):121119.
- [25]马海群.高校信息公开政策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34.
- [26]王世权.日本国立大学治理制度的源流考察及创新发展[J].日本学刊,2013(02):133-149+160.
- [27]Marginson, S. What is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J].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2022,48(04):492-517.
- [29]王彦斌.权力与机构:大学组织运行的社会学分析[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76.
- [31](英)托尼·本尼特.本尼特:文化与社会[M].王杰,强东红,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61.
- [32]吴立保.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文化逻辑[J].中国高教研究,2020(05):59-65.
- [33]王务均,王洪才.学术逻辑与行政激励:中国大学的双轨治理机制[J].大学教育科学,2022(02):28-36.
- [34][52]罗志敏,吴英琪.“掌控”与“不受掌控”之间:大学创新活动的治理限度与逻辑[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5,43(07):29-42.
- [35]丁建洋.科学的本土化应用:西湖大学科学活动的逻辑图景——一种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改革方略[J].江苏高教,2019(03):30-36.
- [36]冯永刚,张琳.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道德教育的空间向度[J].中国电化教育,2024(05):45-52.
- [37]杨光钦.大学治理理念及领导方式的系统集成改革[J].中国高教研究,2020(06):52-57.
- [38]王宁.压力化生存——“时间荒”解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3(09):39-46.
- [39](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21.
- [40]Chu, J S G, Evans, J A. Slowed Canonical Progress in Large Fields of Science[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21,118(41):118-123.
- [41]徐苏兰,余利川.被误用的“非升即走”:功能异化、反噬效应及消解路径[J].江苏高教,2024(09):37-44.
- [42](英)多琳·马西.保卫空间[M].王爱松,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9.
- [43]罗志敏,吴英琪.大学为何越发难以治理?——基于治理限度与行动逻辑的分析[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5,13(03):85-94.
- [44]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389.
- [45](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00.
- [4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35.
- [47]蒋贵友.全球高等教育治理的模式变迁、制度逻辑与路径重构[J].江苏高教,2022(09):32-40.
- [48]梅立润.技术竞争与权力流动: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治理权力的空间配置变化[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03):28-35.
- [49](美)伯顿·卡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305.

[50]董泽芳.理念与追求:大学发展的思考与探索[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488.

[51]Marginson, S. Space and Scale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Glonacal Agency Heuristic Revisited [J].Higher Education, 2022,84(06):1365—1395.

[53]景天魁.时空社会学:拓展与创新[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2017:306.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数字化时代的大学治理研究”(sk20230037);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数智时代教师主体性发展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研究”(2024CXQ074)。

Spatiotemporal Reengineering and Value Re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in the Ag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Wang Dan, Wu Libao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We explore the impact of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on university governance from two aspects: spatiotemporal reconstruction and value reconstruc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ime, space, and values has led to problems in university governance, including time famine caused by biased values, ethical space trespass caused by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 the extension of time and space due to the wave of intelligence, and the hidden risks of capital and technology exacerbating the compression of time and space.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proposes a spatiotemporal adjustment path for university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using information spatiotemporal adjustment to promote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using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spatiotemporal reconstruction to enhance overal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using cultural spatiotemporal reconstruction to support the community, and using standardized spatiotemporal reconstruction to create a new model of circular co-governance.

Key words: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university governance; spatiotemporal reengineering; value reconstruction; spatiotemporal sociology

(责任编辑 郑昕郁)